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14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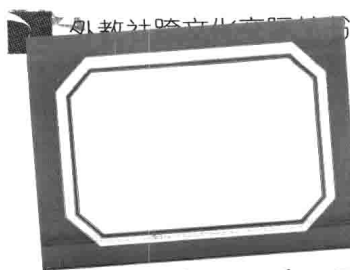


跨

William B. Gudykunst 编

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14

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William B. Gudykunst 编
顾立行 翁立平等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美)古迪昆斯特(Gudykunst, W. B.)编;顾力行,翁立平等导读.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ISBN 978-7-5446-2182-3

I. ①跨… II. ①古… ②顾… ③翁… III. ①文化交流—文集 IV. ①G1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2810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 SAGE Publications Company of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ingapore and Washington D.C. © [2005]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本书由 SAGE 出版公司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图字:09-2012-487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梁晓莉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32.25 字数 891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182-3 / G · 0787

定 价: 6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

Bates Hoffer (三一大学)

Nobuyuki Honna (青山学院大学)

Steve Kulich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 凌 (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 (北京大学)

委 员

Andy Kirkpatrick (科廷大学)

Michael Byram (杜伦大学)

Michael Prosser (上海外国语大学)

Richard Wiseman (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Robert N. St. Clair (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 (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 (南京师范大学)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

申惠中 (悉尼大学)

宋 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力生 (浙江大学)

张红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惠晶 (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恩平 (上海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 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用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的差异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动态多变的过程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学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 15 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 21 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至 20 世纪的 80 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 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 6 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 2000 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上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学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学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 20 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 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导 读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言语交际系终身教授 William B. Gudykunst (1947—2005), 是国际跨文化交际和传播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早期的人类学、语言学 and 文化的社会比较, 以及创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从属于传播学的跨文化交际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Kulich, 2012) Gudykunst 很早就着手建构并使用具有“科学性”的理论, 并逐渐成为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领域最多产的学者。2000 年美国出版的《交际研究报告》显示, Gudykunst 的学术著作数量在全球所有交际和传播学学者中排名第四, 他先后撰写和编著学术著作 28 部, 发表学术章节和论文 200 余篇。

尽管 Gudykunst 的许多实证研究被广泛引用, 但其最杰出的成就还是在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方面。他汇集交际领域权威学者的研究, 于 2005 年出版了这本《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一著作代表了 Gudykunst 的最高学术成就, 也是他在跨文化交际核心理论建构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可以这么说, 迄今为止,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领域还未曾出现其他英文版的相关著作可以与之媲美。

作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Gudykunst 立足于功能主义, 致力于用实证方法科学地评析和建构理论。他认为, 理论必须包含清晰的概念, 能从中提炼出合理的假设, 能测试并验证, 并能为文化之间的行为差异提供合理的评价(主要在国家与族群两个层面)。理论并不纯粹是描述性的(阐释被观察的事物, 或用简单的分类来概括明显的差别), 理论还应当能分析(可使用数据进行验证), 能预测(指出事物间的内在逻辑, 如将一个群体内人们的心理和他们的行为结果联系起来), 能评价(在不同文化中重复测得相似的结果)。

在国内, 最早介绍 Gudykunst 论著主要内容的, 是林大津与谢朝群于 2005 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 理论与实践》。之后, 戴晓东力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讨跨文化交际理论, 以推动中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创新, 于 2011 年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理论》。我们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 可以结合以上两部著作, 以便更好地了解跨文化交际理论, 更好地开展研究。

本书涵盖了一系列经过筛选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为了这部著作的出版, Gudykunst 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此过程中, 他指出, “如今, 涉及跨文化交际各个层面的理论至少有 15 个。”(Gudykunst, 2002, p. 183) 这些理论可分成七大类: 意义建构、沟通准则、文化模式、调整 and 适应、身份认同的形成 and 调整、人际交流的心理过程, 以及传播的组群和网络。(Klyukanov, 2005, p. 1) 遗憾的是, 尽管 Gudykunst 收录的理论涉及面很广, 但他却将相当一部分理论排除在外。比如, 他只字未提有关价值观的众多理论(或许他认为价值观的理论只是对文化模式的解释), 以及有关冲突、非言语交际、符号模式的交流(或符号学)等一系列在跨文化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这些没有被 Gudykunst 收录的理论, 在其他许多跨文化教材中都作为重点进行了介绍。应该承认, 本书缺乏的是一种多范式的理论视野, 如 Martin 和 Nakayama (1999) 总结出的四个典型范式, 或 John

Baldwin 等人(2006)提到的五个范式;或者说是 Gudykunst 忽略了“交际的理论建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其他表述方法。”(Craig, 1999, p. 20)

当然,瑕不掩瑜,本书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必读的理论著作之一。现在我们将逐一探讨本书中各章节的相关主题。全书共分七个部分,除第一部分综述外,其余六个部分分别从交际与文化相协调、交际中的跨文化调节、交际互动中的适应、身份问题、有效沟通和决策,以及调整与文化适应来反映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理论构建。

第 1 章 综述

四位合作者 Gudykunst、Lee、Nishida 和 Ogawa 认为,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在过去 20 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本文中,Gudykunst 及其合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概述,其中包括本书中没有收录的理论。其目的是“置理论于语境之中”,同时帮助读者充分了解理论原创者在理论建构上的种种取舍,并对这些取舍提出他们的看法。

基于一系列的元理论假设,Gudykunst 及其合作者认为,把文化融入交际理论有三种模式:第一,将文化和交际合二为一的理论;第二,解释交际中文化多样性的理论;第三,解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理论。他们认为大多数理论属于第三种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又可以分成五个类型:①有关有效交际的理论;②有关顺应和适应的理论;③有关身份认同管理的理论;④有关交际网络的理论;以及⑤有关针对新文化环境进行调节和适应的理论。因此,有关跨文化交际的 26 种理论被系统地分为七大类。然后作者们简要介绍这 26 种理论,以便读者可以超越本书的界限,对跨文化交际理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最后,Gudykunst 及其合作者针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看法。首先,他们强调建构更多具有主观导向理论的必要性,以及更好地整合主观导向理论和客观导向理论的必要性。其次,他们认为有必要让来自美国之外的学者用母语建构本土理论。第三,跨文化交际理论需要融入“权力”因素。社会变革及促进变革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在书中得到反映,也就是说,批判性视角是本书所缺乏的,也是将来发展的方向之一。第四,鉴于许多理论互相匹配,有必要整合这些理论。最后,我们还需要设计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理论,以提高我们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认识水平。

第 2 章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

在阐述理论之前,作者首先举出两个结果截然相反的跨文化交际事例:一个是来自中美洲的代表团和来自北美洲的代表团之间的会面,另一个是美国纽约一法庭的法官与被告之间的对话。前者由于彼此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特征,交际顺畅且卓有成效。而后者中,由于 Duffy 法官与恐怖分子 Yousef 在陈述中都试图压倒对方、占据上风,交流最终以失败告终。当然,这段庭审也没能阻止之后恐怖主义者对美国的袭击。这两个事例充分说明,即使沟通双方都从本文化出发,却能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这两个事例贯穿于整个章节,用以阐明作者提出的意义协调管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简称 CMM)及其分析模型和工具。

在这一章里,作者从解释功能、批判功能和实践功能三个方面对意义协调管理理论进行阐述。

作为一个解释性理论,CMM 试图回答两个问题:①当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交流时,他们究竟在做什么?②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提出了“行为者意义的级层模型”,以揭示交流语境中隐含的不同层次的意义。随后,作者借助开头的两个事例,对该模型如何解释行为者的多层意义进行了说明。在这一模型里,文化被放在具体事件、人际关系和自我识解的脉络中进行考量。

作为一个批判性理论,CMM 要解决的问题是“交流双方在一起做什么”。这一理论的批判性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身份、事件、关系和文化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基于此,作者提出了“蛇形模型”,用以展示这一构建过程。“蛇形模型”帮助我们关注交流中“你来我往”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

作为一个实践性理论,CMM 能够帮助我们弄清“如何创造更好的社交环境”。CMM 能够丰富人们的交流方式,并且通过干预,帮助交际者看到以前不曾看到的交流方式。除了“级层模型”能为干预提供不同的切入点外,作者还推荐了另一个 CMM 工具,即“雏菊模型”,用来分析交际情境中丰富的沟通内涵。该模型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实际对话中隐射的其他对话内容。此外,作者还提出“LUUUTT 模型”,帮助交际者拓展交际的具体内容。“LUUUTT”是其组成部分的首字母缩写:已经历的故事(stories Lived)、未讲述的故事(Untold stories)、未听过的故事(Unheard stories)、未知的故事(Unknown stories)、已讲述的故事(stories Told)以及故事的讲述(story Telling)。

为了更好地体现 CMM 的实用性,作者认为需要发展一些技巧,来创造更好的社交环境,而技巧的本质体现在理论的几个关键词上:协调,意义管理中的连贯性和神秘性,以及价值观的持守。最后,作者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为目的,建议将交际理论的重点逐步转向语境重构修辞学和转化型交流技巧。

第 3 章 言语代码理论

了解人们在特定情境或群体模式中如何使用和理解语言,对提高本文化意识和有效处理文化差异十分重要。为满足这一需要,Philipsen 等人在文化交际研究中提出了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s Theory,简称 SCT)。该理论认为,社区谈话蕴含不同的交际代码。Philipsen 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构建的,与交际行为相关的概念、意义、前提和规则。他认为,建构该理论的目的有二:(1)从大量关于文化话语的田野研究中提炼精髓,(2)为将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言语代码理论是对 Dell Hymes 创造性工作的积极响应。Hymes 从特定语境角度研究语言的“交际民族志”,对社会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言语代码理论也建立在 George Herbert Mead 的符号互动主义传统之上,因为 Mead 认为,所有的交际活动都是用符号编码的。此外,言语代码理论得益于 Basil Bernstein 对不同社会阶层语言中限制性与详述性编码的描述。同时,该理论受到 Kenneth Burke 研究的启发,将交际诠释为关系中上演的戏剧性脚本,而学者则作为评论家来发现交际者的意图。

Philipsen 等人归纳了言语代码理论的三个典型特征:①言语代码理论基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

对交际行为的观察;②言语代码理论通过意义和价值的情景代码来解读交际行为;③尽管该理论是对特殊的言语方式的研究,它也揭示了交际行为的普遍规律。代码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言语代码不像摩尔斯密码,意义完全对等,而是观察者分析建构的概念,用以解读和解释某一特定言语社区的交际行为。

言语代码理论由六个命题组成:

命题 1.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言语代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我们都能发现,已经形成的有关交际行为独特的符号系统、意义系统、前提条件和规则系统。

命题 2. 在任何言语社区都存在多重言语代码,使用哪一种代码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定。

命题 3. 言语代码包含了某文化特有的意义系统,与人性(心理学)、社会关系(社会学)和策略性行为(修辞学)有关。

命题 4. 言语的重要性体现在对话者使用言语代码形成交际行为的意义,即交际行为的参与者是如何使用言语代码来解读自己或者其他人的交际行为的。

命题 5. 言语代码的细则、使用规则和前提条件与言语本身交织在一起。注意和描述言语代码的关键在于观察和倾听交际行为。

命题 6. 通过对共享的言语代码的巧妙使用,可以预测、解释和控制交际行为的可理解度、审慎性及道德标准。Philipsen 相信,只有成为参与者或观察者,才能控制和预测他人说什么、做什么。

总之,言语代码理论提出了一个解释和预测特定言语社区交际活动的方法,包括言语代码的独特性、内容和观察方法,以及言语代码在文化内部对人们产生的影响(Griffin, 2003)。代码论带动了旨在揭示文化与特定社区交流间关系的研究,因为该理论帮助研究者形成一套言语代码,用来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信念与价值观体系的核心要素。

学界对言语代码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种,分别由 Stewart (1997) 和 Griffin (2003) 提出。Philipsen 对这两种批评总结如下:①言语代码论不能解释话语权现象。这是理论假设、方法论框架和田野调查资料整合方面的一种缺失。②言语代码论把文化看得太具确定性。其结果是,文化被视为一种静态的存在。

第 4 章 更新的面子协商理论

Ting-Toomey 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的切入点是跨文化互动中的面子意识和面子协商。她认为,面子是“一个人希望别人给予他/她的、受到社会赏识的自我价值感”(Ting-Toomey & Kurogi, 1998, P.187)。在本文里,Ting-Toomey 更新了她 1998 年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Ting-Toomey & Kurogi, 1998),整合了文化层面的维度和个人层面的属性,用来解释面子问题、冲突方式和面子行为。

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更新的冲突面子协商理论的基本假设;第二,理论的核心区域;第三,面子行为的文化层面解释;第四,与面子相关的冲突行为的个人层面因素;第五关系层面和情境层面的特征;第六,今后的研究方向。Ting-Toomey 的面子协商理论共有七个假设,五个核心区域,24 个命题。

第一部分的前五条假设涵盖了文化层面的解释(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大/小权力距离的文化变量维度),讨论文化维度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预期和面子行为。第六条假设指出,文化变量维度连同个人因素(如自我识解)、相互关系(如亲密程度、社会地位、群体内/外)和情境因素(如话题的性质)影响某些特定场合下的面子行为。综合最后的第七条假设,跨文化面子行为能力可以概括为:合理调配知识、留心(mindfulness)并运用建设性的冲突技巧,得体、有效、灵活地处理交际互动中的身份问题。

面子行为的核心区域有五个,可初步引向建设性的冲突对话过程:①面子取向或面子关切,②面子动向或面子动向模式,③面子行为互动策略,④冲突交际方式,⑤面子的主旨范畴。

基于过去和最近的研究,Ting-Toomey 在本文的面子协商理论中提出了 24 个理论命题。其中,12 个是文化层面的命题,10 个是个人层面的命题,2 个是关系和情境层面的面子行为命题。

最后,她提出了今后面子协商理论的研究方向。不同文化中,有关面子关切和冲突方式的情感和情境方面的研究仍然缺乏,需要更多的研究。面子动向、面子暂时性(temporality)和面子能力也是今后面子行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需要进一步研究面子行为和自我识解之间的关系,以及面子行为在处理交际困难和障碍时的作用。

第 5 章 会话制约理论

在本文开头,作者 Min-Sun Kim 对从规则或规范的角度出发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做法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文化差异与交流行为差异的理论关联缺失,二是对交际策略选择的预测缺失。因此,研究不能局限于对不同群体特质的描述,而是需要了解不同群体较为相似的交际行为背后的各种动因。会话制约则能够将策略的选择与促成选择的背景知识联系起来。本章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即会话制约理论(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系统地解释会话制约如何指导交际策略的选择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

基于上述批判和分析,作者建议以目标为切入点对社会交际互动进行研究。她对以往有关社会交互目标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发现交互目标由低到高分三个层次:①期望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策略性目标,②贯穿整个交互过程的主要交流目标,③制约个人会话风格的全局性目标。

在对人际交流能力二维体系的批判中,Min-Sun Kim 指出,“得体性”与“有效性”的许多交流技巧反映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大多数用词对交流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二维体系忽视了人们对“得体性”与“有效性”的不同理解。因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进行跨文化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找到适用于各种文化的会话策略,作者提出了五维会话制约体系,即五个以文化为基础的会话制约因素:①表述清晰,②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③避免伤害听者的感情,④避免听者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评价,⑤有效性。

Min-Sun Kim 及其研究团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得体性”与“有效性”在跨文化语境中并不完全适用。而她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文化之间在“有效性”评价中的排序和策略评级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她认为,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上述五大会话制约因素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维度更具优势。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文化或国别来划分不同人群并加以比较,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因而作者建议还要在个人层面对文化维度进行相关性研究。Min-Sun Kim 及其研究团队做了两项测试:一是测试“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与“独立性—互依性”自我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测试自我识解及其交际者眼里会话制约因素的重要性在文化内部呈现的差异。这两项测试发现,自我识解对解释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交际行为的差异都适用。

对于诸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独立性—互依性”的两分法,Min-Sun Kim 指出,两分法中的两个极端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有可能共存的。最后,Min-Sun Kim 强调,会话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交际策略有效性的准确推测。会话制约研究的实用性,就在于它为解释跨文化交流和误解以及多元文化培训提供了一个框架。

第 6 章 交际顺应理论

交际顺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简称 CAT)的前身是言语顺应理论。言语顺应理论认为,说话者在与他人交流时,运用言语策略来获得对方的赞同或者显示自己的个性。Giles 等人(1987)随后将此理论的适用范围拓展到整个交际过程,并将理论命名为交际顺应理论。Coupland 等人(1988)将交际顺应理论运用到跨代交际中,并提出了跨代交际理论模式。Gallois 等人(1988)将该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之中,强调语境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之后,Gallois 等人(1995)提出了跨文化语境下的交际顺应理论。

交际顺应理论强调跨文化交际的跨群体特征。因此,理论的第一部分是有关交际的社会历史语境研究,其中包括交际双方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和有关交际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在不同的文化中往往有所不同。

交际顺应理论的第二部分有关交际者的“顺应取向”(accommodative orientation),即在跨文化交际时,人们将交际视为人际交际、群体交际或两者相结合的交际的倾向。“顺应取向”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①个人因素,如社会角色和个人身份;②跨群体因素,如交际者对其他群体的态度;③初衷(initial orientations),如是否有决心长期顺应别的群体。

交际顺应理论的第三部分是“当下情景”(immediate situation),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①社会心理状态,如在某一情景中交际者的人际交际取向或群体交际取向;②交际目标与聚焦接受者(goals and addressee focus),如交往的动机、进行对话的需要、建立关系的需要;③社会语言策略,如近似语策略和语篇控制策略;④行为和技巧,如语言和口音;⑤归类和归因。

交际顺应理论的最后部分是“评价和未来交际意图”。作者指出,当交际者视交际对象为群体典型成员并有正面评价时,他们将来就会更乐于与交际对象及其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交流。

就像前面提到的 Ting-Toomey 的多重面子理论一样,交际顺应理论透过多重视角,揭示了跨文化交际的复杂性。该理论试图解释交际的需要和动机,以及言语交际中涉及社会文化领域和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各种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没有涉及非言语交际,因此如何将非言语交际纳入顺应理论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7章 预期违背理论和互动适应理论

本文的两位作者 Burgoon 和 Hubbard 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指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些准则又带来对他人行为的预期。遵循这些准则,达到这些预期,是跨文化交际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这两个理论就是专门探讨文化内部和不同文化间的人际关系的适应模式以及人们遵循和违背预期的结果。

他们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简称 EVT)。预期违背理论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是带着预期的,他们对违背预期的情况会作出反应。文章首先解释了五个与跨文化互动密切相关的术语:

1. 交际预期(Communication expectancy)是指期待中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模式。预期是基于社会法则和规范以及个人层面的典型行为方式(individual-specific patterns of typical behavior)(Burgoon, 1995)。预测性交际预期受三种因素的制约:交际者因素、关系因素和语境特征。

2. 预期违背(Expectancy violation)是指明显背离于预期、超出预期范畴的行为,即指一反常态的行为。

3. 交际者值(Communicator valence)是指能影响交际预期的交际者特征。交际者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特征会影响预期违背的解释和评估(Burgoon, 1995)。

4. 行为和预期违背值(Behavior and violation valence)是指交际个体偏离常规的行为因为新奇或不同寻常而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警觉。预期一旦被违背,人们往往会注意违背者和违背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对交际者特征关注度的提高可能会放大其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对预期违背行为关注度的提高会启动评估过程。

5. 预期违背的效果(Effects of violations)是指积极的预期违背会比达到预期带来更有利的交际效果,消极的预期违背会比达到预期带来更多的不利结果。

Burgoon 认为每种文化所预期的“内容”随着 Hofstede (1980)的文化维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集体主义文化往往比个体主义文化更期待委婉(indirectness)、礼貌和非直接(non-immediacy)的交流。不确定性规避往往与交际行为受规则和社会规范的控制程度相关(Burgoon, 1995)。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与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相比,较少受规则和规范的制约。权力距离会影响对社会地位预期的违背的解读。比如,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预期违背行为被认为是对先赋角色行为(ascribed role behavior)的违背,随之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带来消极的结果。

预期违背理论主要有两个缺陷:①它不能完全解释人际交往中极为普遍的互惠现象;②它没有解释当交际者值和行为值(behavior valence)不一致时,两者是否可以相互取代这个问题。

为了弥补上述缺陷,Burgoon 及其研究团队发展了新的理论——互动适应理论(Interaction Adaptation Theory, 简称 IAT)。IAT 是在 EVT 的基础上,融入了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互惠压力”(pressures toward reciprocity),将其作为解释框架的一部分。IAT 旨在为多重共时调整模式提供综合性的分析,该理论共有九条基本原则:

- 第一,人有相互适应的自然倾向。第二,在生物层面,除非人身安全和舒适感受到威胁,否则人们就有责任协调和整合。第三,人们既需要相互接近,又需要相互分离,接近与规避成为一种辩证的张力。第四,在社会层面,在日常友好的交谈中,人们有责任相互磨合、互惠互利。第五,在交

际层面,由于参与者对自身的行为更有意识、更加留心,互惠和补偿的行为都有可能发生。第六,调整和适应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受以下因素的制约:(a)个人行为方式的一致性和一贯性倾向,(b)调整的内在原因,(c)自我监控技巧或对方监控技巧,(d)行为效果调整能力,(e)交际实践和预期中的文化差异。第七,生物、心理和社会力量相互结合,决定磨合、协调和互惠等行为发生的范围。第八,文化背景或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对人际互动起系统调节的作用。第九,一系列的交际行为比个别的、孤立的交际行为更加容易被精确分析。

IAT 的五个基本要素是:要求(Requirements)、预期(Expectations)、欲望(Desires)、互交立场(Interaction Position)和实际立场(Actual Position)。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 R、E、D、IP 和 AP 等要素,需要对 R、E 和 D 三个因素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可以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族群或文化群体中开展,也可以在某个国家的多元文化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中进行。

第 8 章 共文化理论

在过去几年中,本文的第一作者 Orbe 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那些处于主流社会结构边缘的群体的交际经历(这些群体曾被称为“亚文化”,但这个名称暗含贬低之意)。基于这些研究,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应运而生。第二作者 Spellers 则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她的主要研究领域。这篇文章主要探讨共文化理论的起源、核心概念和现有的相关研究,并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指明方向。

Orbe (1998)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交际是指弱势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活动”。共文化理论是以现象学研究手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该理论主要源于缄默群体理论(Kramarae, 1981)和视角理论(Smith, 1987)。共文化理论将有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纳入研究体系,且其研究对象不仅限于此。

共文化理论的建立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共文化群体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第二,当遭遇主流社会结构的压迫时,共文化群体成员使用特定的交际风格或策略以取得交际的成功。弱势群体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的交际过程受六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影响:①希望看到的结果,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际一般有同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分子)、适应(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受共文化群体成员)和分离(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性)三种结果;②经验领域(个人全部的生活经历);③能力(个人从事不同活动的的能力);④情境(在什么地方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际);⑤预想的代价与报偿(某种做法的利与弊);⑥交际方式(即攻击性的、自信的或不自信的交际方式)。这六个因素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是共文化决策争论的焦点。

“交际取向”(Orientation)一词是指弱势群体成员在日常交际中采取的特定立场。每种交际取向都由特定的交际目标(同化、适应或分离)和交际方式(不自信的、自信的或攻击性的)共同决定,同时也受到经验、能力、情境以及预想的代价与报偿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作者在文中共提出了九种交际取向:①若交际者不自信且与主流群体分离,则会“回避交际”、“维持人际交际障碍”;②若交际者不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增加可见度”、“消除刻板印象”;③若交际者不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强调共同点”、“谋求积极面子”、“进行自我反省”并“避免冲突”;④若交际者自信且意在分离,则会“表达自我”、“发展群体内部交际网络”并“抱守刻板印象”;

⑤若交际者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表达自我”、“发展跨群体的交际网络”、“发挥联络者的作用”并“教育他人”;⑥若交际者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对交际活动“充分准备”、“操控刻板印象”并在交际过程中“讨价还价”;⑦若交际者咄咄逼人(aggressive)且意在分离,则会在交际中“攻击他人”、“破坏他人活动”;⑧若交际者咄咄逼人但意在适应,则会“正视交际活动”并“从中获益”;⑨若交际者咄咄逼人但意在同化,则会“游离其外”、“策略性地保持距离”并且“自我嘲弄”。(参见本书 p. 180, Table 8.2)两位作者还详细阐述了共文化理论的应用、拓展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指导意义。

第9章 身份管理理论

“人际交流”与“面子”是 Imahori 与 Cupach 提出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 简称 IMT)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位作者 Imahori 和 Cupach 将“身份”理解为“个体了解自身与外界的框架”。身份管理理论着眼于文化与关系身份的相关领域,力图厘清身份管理与面子策略在关系发展中的关系,以加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解。

与下一章中 Ting-Toomey 的身份协商理论一样,身份管理理论也认为“得体性”与“有效性”是衡量跨文化能力的通用标准。然而,由于不同文化对“得体”与“有效”的期望不同,因此,跨文化能力同时具有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更重要的是,跨文化能力还具有文化协商性,因为关系双方需要协商,而协商必然受协商者文化背景的共同影响。

身份管理理论将身份管理置于人际交往过程中,提出了三个互相联系、循环往复的阶段: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与再协商(renegotiation)。在“试探”阶段中,双方努力寻求共同点,到达一定程度后便进入“交织”阶段,双方的符号与规则渐趋一致。最后是“再协商”阶段,各不相同的文化身份成为双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负面的交际障碍。

“面子”是身份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两位作者提出了四种面子行为策略:自我积极面子、他者积极面子、双方积极面子和双方消极面子。在本文中,他们还对“身份冻结”(即由于初次会面时存在刻板印象而导致面子受到威胁)、“自我—他者身份对话”与“积极—消极面子对话”中的不同策略与细节进行详细的阐释。

第10章 身份协商理论

Ting-Toomey 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 简称 INT)主要探讨来自不同种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双方如何展开身份协商互动的问题,该理论特别适用于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身份研究。Ting-Toomey 在该理论中一再强调“留心”(mindfulness)这一概念,并提出了身份协商能力的构成要素、评判标准与结果。她认为,身份是“每个人从家庭、性别、文化、种族与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反思性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参见本书 p. 212),是跨文化交际过程的解释机制。与本书第四章的“面子协商理论”相比,Ting-Toomey 在本文不再仅仅着眼于矛盾管理中的面子行为,也不再将高低语境及权力距离作为主要的解释工具。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首先,作者讨论家庭和性别社会化与身份认同间的关系;随后,作者介绍文化与种族身份形成中的价值内容与显著性,认为它们是身份协商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第三部

分详细介绍了身份协商理论中的十个核心假设;接下来,详细介绍“种族—文化身份建构”和“种族身份发展”两个模型;最后,作者阐释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的构成要素、评判标准及结果。

Ting-Toomey 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影响个体的自我意识,而自我身份认同又同时受到群体、个人及情境等因素的影响。身份协商理论中的十个核心假设是围绕着五组跨越身份边界的辩证概念而产生的,这五组概念包括身份的安全性或脆弱性、身份的包容性与差异性、身份的可预测性或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性与自治性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可变性。此外,作者认为情感、行为与认知是跨文化交际的三种重要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对个体身份协商有着重要作用。

第 11 章 文化认同理论

作者 Mary Jane Collier 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阐述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fications Theory)中的假设、公理或定理,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与研究经历,从批判性角度提出了身份认同研究的新思路。她反复强调,“学者”同时应该是“实践者”,需要具备“实践智慧”。她的研究目标是:让自己的“生活、工作与言行成为社会正义的化身,既合乎伦理,又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见本书 p. 236)。在文中,Collier 列举了若干亲身参与的研究个案,如对参与和平建设的年轻妇女的采访(采访对象对自身有不同的身份认同,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以色列人”)以及对法庭中参与家庭虐待案件审理的法官和律师的采访,等等。她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一定具有政治性,且应当将政治性体现在理论建构中。Collier 曾在许多国家开展实地研究,如美国、南非、巴勒斯坦、以色列等,与当地居民有过深入的交流。这些经历让她坚信,政治语境、机构语境、组织语境及人际关系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重要因素。

尽管 Collier 在文中没有详细列举文化认同理论的具体定理,她还是提出了她与研究团队从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相关原则与假设,强调了国家、种族、阶级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她认为,文化身份是自赋(avowal:自我观念)与他赋(ascription:形成于与他者的交际)的结合体,是在协商与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正是在交际过程中,个体或是群体对自身有了更明确的定义与建构。然而,交际双方权力的差距会对身份建构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会限制双方的身份协商。因此,“理论的建构”必须与真实生活与经历紧密相联,研究者也必须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偏见与不公有所察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应努力寻求改变不公正现象的有效方法。

第 12 章 交际身份认同理论

Hecht 等人提出的交际身份认同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简称 CTI)是在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与身份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交际身份认同理论与后两种理论又有不同,后两种理论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而前者强调的是交际,即通过交际互动形成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常常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的核心概念之一。交际身份认同理论拓宽了这一概念的范围。该理论认为,人类天生是围绕交际、关系和群体而生的社会生物,人在多重的、变化中的认同